

民國奇人朱子橋

文 / 朱漢

逝去的年代有時會讓人感懷，即便是在當年那個亂世中剛剛建立的民國也同樣如此。毋庸置疑，如果說 1949 年結束的中華民國可稱為是一個朝代的話，那麼它離我們最近。不用說，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但凡坊間聽到要提民國時期的那些人和事兒的時候，不外乎有那麼幾種反應：有人愛聽，有人則不以為然，有的感覺作者是在述說野史、在嚼舌頭、說古論今是為了搬弄是非。筆者認為，其實不必過分敏感。因為民國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不可分割的時期。單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大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在。並非以前的人和事都是老朽的、被人嗤之以鼻的，而當今人做事就文明、聰明、值得頌揚。恰恰相反，民國時期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並非個個禍國殃民、貪污腐敗。他們當中有些人一生不積財、樂善好施，不損人、不利己。他們中也不乏有著愛國情操、有著愛民情懷的人士。譬如愛國人士張謇（季直）、朱慶瀾（子橋），他們都在歷史的進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讓後人永遠難以忘懷。隨著時間的流逝，民國的那些人和事、那些範兒並沒有淡出人們的視線，一旦遇到合適的溫度，這種精神的種子仍然能夠萌發、能夠生長。因為，它畢竟是蘊藏在中華民族深處的人性光輝和精神的脊樑。

民國人士朱子橋（慶瀾）就是這麼一個值得回憶的大人物。他為了賑濟救災，傾囊而出；為了抗日救亡，他毀家紓難，真正做到了生不帶來死不帶

去，也不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分一厘財產。民國時代的礦業鉅頭李晉¹回憶說：朱子橋以菩薩心腸、佛陀行徑，救飢拯溺，事必躬親。²地質學家丁文江在《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一文中也提到：朱子橋為了賑務奔走，獨個兒肩行囊。在江輪中躑躅於統艙之中，尋覓床位。也曾見其在放賑途中，為看守賑糧，在烈日下就鐵篷車內自炊自爨。³著名愛國人士杜重遠也多次在他的《新生》週刊內提到：作為東北義勇軍的領導人，朱慶瀾先生是奔走國事數十載，不避嫌怨，不辭辛勞，反而因公招忌，積勞成疾。⁴這些文字猛烈地、辛辣地、諷刺地抨擊了當時那些消極抗日的人，熱情地表達了對朱子橋的敬佩和讚揚。胡適在1933年《獨立評論》上發表的《全國震驚以後》一文中，對於承德被丟失一事，講到當時軍隊的軍官貪污墮落和地方政府貪污腐化時，引用了朱子橋的一句“一個軍官如果有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就決不能再打仗了”的名言。⁵李晉說：那些年間，國內遇有水旱災荒或抵禦外侮行動中，其救濟工作、領導東北義勇軍是定然缺不了他。一般心理，早把他當作活佛看待。認人而不論事，只須朱子橋老出面領導，無不心悅誠服，此響彼應。⁶朱子橋去世後，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延安方面派員祭奠，並送“任勇慈祥”布匾，以表敬仰。⁷在重慶，一級上將馮玉祥發表《哭朱將軍》。朱慶瀾的舊部、代理參謀總長、一級上將程潛也含淚寫下《朱子橋先生輓詩五首》。⁸甚至蔣介石在談及國內外重大賑災事宜時，都不得不平心而論，在他的日記中

1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1949年以後，他寓居香港，已屬高齡之人，但敢說敢為、為人豪爽，待人接物，仍不減當年。1966年2月12日在香港寓所安然去世。

2 李晉口述、秦嶺雲筆錄、蔡登山編：《旱災、水災、兵災與朱子橋》，《民國政壇見聞錄》，台北：獨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

3 丁文江：《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載《獨立評論》1933年2月26日第39號。

4 杜重遠：《獄中雜感》，1937年3月，第128頁。

5 胡適：《全國震驚以後》，載《獨立評論》1933年第41號。

6 《朱子橋領導東北義勇軍經過》，載香港《春秋》1963年第142期。

7 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資料。

8 張學繼：《民國第一善人朱慶瀾》，載香港《春秋》2011年第1028期。

寫下了這麼一句話：朱慶瀾來訪，此老可佩也。¹

朱子橋在他那叱咤風雲的一生中，真可稱得上是位奇人。他給世人留下了太多沉思、太多尊敬和感歎。這位奇人非常值得咱們去拾遺、去追尋。筆者想試著從那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碎片中再去追溯，認識一個真實的民國奇人朱子橋。

民國人士朱子橋的奇人奇事實在太多。如至今都無法讓人理解，朱氏在民國大早年間兩次設壇求雨的成功。又如：為支持馬占山的江橋抗戰，他親自隨車押運慰問物資，連闖日本關東軍數道關口，直至將援助物品送到堅守江橋抗戰的馬占山手中。再如：為創建東北義勇軍，又如何當面不客氣地教訓張學良等等。他一生奇事太多，真是無法一一列舉。筆者在此只挑選幾個例子來寫，讓大家來看看這位民國年間的封疆大吏、將軍、省長、委員長和一般老百姓倒底有什麼不同。

一、一支特殊的外國援華醫療隊，居然是在朱子橋的努力和幫助下奔赴延安的？奇了，朱子橋這麼大的官兒，怎麼還當過醫院院長？

1939年的抗戰期間，一支特殊的援華醫療隊由五位印度醫生所組成。他們如同白求恩一樣，來到了戰火紛飛的中國。他們是愛德華、卓克華、巴蘇華、木克華和柯棣華（他們為了表達自己的心願，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都加了個“華”字），他們最終目的地是延安，但是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以及其他種種因素，沒能去成延安而被留在了西安。後來在新西蘭人艾黎的幫助下，他們與朱子橋取得了聯繫。朱子橋立刻面見並說服當時的陝西省主席蔣鼎文，准予放行，順利地將這支援華醫療隊一行五人送往延安。援華醫療隊在

1 摘錄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e）1931年3月20日《蔣介石日記》。

抗日戰爭的前線中救死扶傷，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其中就有中國人民所熟悉的柯棣華醫生，他犧牲在抗日前線，年僅三十二歲。¹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紀念朱子橋。其實，朱子橋這樣的舉動絕非偶然。因為他既切齒於不抵抗導致東北淪陷，又懷恨於日本人佔領東北——他的第二個故鄉，乃至佔領全中國。故“九一八”事變後，他親自領導東北義勇軍起兵抗日。“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朱子橋又挺身而出，堅決地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那麼如今又有誰能知道朱子橋與近代中國第一個公辦中醫急救醫院——中醫救護醫院是什麼關係呢？

話說抗戰時期，中央國醫館與國民政府中央賑務委員會合作建立的中醫救護醫院，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公辦的中醫急救醫院。²而朱子橋就是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個公辦中醫急救醫院首任院長的史實，卻鮮為人知。1937年8月，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南京。中國軍隊沒有制空權，軍民死傷無數，下關軍人、難民傷亡更是慘不忍睹，而當時又缺醫少藥，只能眼看著那些無醫無藥可治的傷兵和難民死亡。更可怕的是，這還容易導致瘟疫蔓延，故軍心、民心都惶惶不可終日。時任中央賑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子橋更是心焦如焚，立即與國醫館館長焦易堂³商議，在南京老虎橋設立中醫救護醫院，在下關熱河路設第一診療所，為大江南北的抗日軍民提供治療。當即，陳果夫、陳立夫、饒鳳璜、焦江定、焦易堂成立董事會，焦易堂任董事長，朱子橋出任院長，朱的老下屬饒鳳璜出任副院長。

一次，筆者與幾位老中醫的後人說古論今，講到朱氏在抗戰初期，曾出力籌建近代中國第一個公辦中醫急救醫院時，一位旁聽者質疑道：嗨！奇

1 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資料。

2 南京失守後，醫院奉命後撤。1938年3月中醫救護醫院院址選在重慶大樑子，1939年更名為“中醫救濟醫院”。朱子橋去世後，醫院於1946年因無經費來源被迫停診。

3 焦易堂為朱子橋摯友，早期同盟會會員，陝西人。1935年，繼居正之後，曾出任國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長。2005年，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回中國大陸演講，提到幫助他父親連震東恢復中國國籍的人就是焦易堂。

了，朱子橋這麼大的官兒，怎麼還當過醫院院長？不信嗎？那不妨去中醫學檔案資料館去查一查《中醫救護章則摘要》或者《賑濟委員會設立中醫救護醫院工作報告書》，就可真相大白了。

二、他到底是封疆大吏，還是運鹽的夥計？

這個故事講的是 1912 年至 1915 年間那檔子的事兒：朱子橋繼畢桂芳後，出任黑龍江護軍使、民政長（後改稱巡按使、督軍、省長），被封為鎮安右將軍、陸軍上將。用現代話說，就是軍政一把抓。當時的黑龍江乃屬初闢之省，地廣人稀，由外來謀生者多。但謀生者又如鳥雀，秋去春來。也因此“北大荒”村居寥落，女子奇缺。當地民謠曰：“北大荒，好荒涼，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沒有大姑娘。”有鑒於此，朱子橋於 1914 年提請北京政府籌辦黑龍江女子教養院，這樣就能做到既教又養又扶孤。在呈文中，他提到開辦經費並提出了三點具體的籌集資金的方法。還發出募捐啟事，倡議各界捐款，並自己率先捐出一萬大洋，並常以手帕裹燒餅，騎馬奔走呼號於鄉里。這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實屬罕見。那麼，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又是如何認識朱子橋的呢？

丁文江在他的《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一文中，提到了朱子橋為了賑務奔走，獨個兒肩行囊，在江輪中躑躅於統艙之中，尋覓床位，這麼一段往事。丁文江回憶說：誰都知道朱子橋將軍是一位慈善家，留心東北近事兒的人也許知道他也是義勇軍的首領。民國十一年（1922 年）的夏天，中國科學社在南通開會。丁說他因有要事，就想坐船先去上海。聽說朱子橋將軍也要上船（其實倆人以前並不認識，他之前只聽說過朱是一位廉潔的官員），故到了南通江口，就向旅館打聽朱子橋將軍，卻沒有人知道。不料，一出旅館，就看見一位客人，身長六尺以外，挺著胸膛，在他前面走著。丁文江說他心裡一動，心想前面這位莫不是朱子橋將軍？再一看，前面的那位走得很快。

旅館的夥計幫他拿著兩個極大的皮包，還跟他不上，這人就接過一個皮包自己拿著。丁文江心想，一個做過巡按使、將軍的人，在內地旅行，豈有不帶一個當差的道理，丁認定這不會是他要找的人了。不料，又聽見那人說一口山東話，丁文江又疑心起來，就低頭向旅館送客的夥計打聽。夥計回道：“這是一位鹽店的管事。”但過不多久，又見自己的一位熟人在與這位鹽店的管事聊天，故也就隨便上前敷衍幾句，請教姓名之類的客套話。誰知這位鹽店的管事回話說：“姓朱。”“台甫呢？”“子橋。”丁文江這才恍然大悟，眼前這位“鹽店的管事”，居然就是他要找的朱子橋將軍。丁文江又問：“子橋先生預先定了艙位罷？”丁文江以為他一定是坐大餐間的，哪裡曉得朱子橋說：“艙位用不著訂，如果房艙沒有地方，總可以在統艙裡擠一擠的。”結果船到了上海，也沒看見有人來接，他自己提著兩個大包下船走了。丁文江事後說：我現在只能把我的觀察寫出來，表現他的人格。

三、這位朱省長撰寫頌辭贈香港大學首屆畢業生，但這個省長卻又與廣東最好的買賣無緣！

據香港大學圖書檔案材料顯示：1916年12月，廣東省長朱子橋收到了香港總督梅含理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以及香港大學校長查理爵士（Sir. Charles Eliot）的邀請信函，參加港大首屆畢業生典禮，又有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約他同赴香港參加觀禮，盛情難卻，不得不赴港一行。為聯絡感情和增進友誼，他精心撰寫了頌辭作為賀禮。其實，該頌辭於12月14日前早已撰寫妥當了，在13日先交由教育專員程祖彝代表赴港，而朱子橋則乘楚豫號軍艦於14日上午抵達香港。當天，有香港總督秘書官以及軍樂隊在碼頭迎接。隨後，他坐車直抵香港總督府，晚上到香港大學參加慶典活動。也許，這段史記對於內地的史學界來說可能算作一條新聞，那就是時任廣東省長的朱子橋於民國五年（1916年），親自撰寫頌辭贈予香港大學首屆畢業生。

對於這段史料的記載極為少見，知情者並不多。但是筆者的好友、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張慕貞女士應該算上一個。其次，筆者另一位友人、原香港大學教授顧植（外交家顧維鈞的孫女）也是此文件的發現人之一。順藤摸瓜也就找到了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的資料，又承蒙香港史學家李龍鑣先生的幫助，在港大圖書館內幫助拍攝了頌辭的照片。從照片上，筆者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朱子橋用隸書寫的頌辭。朱子橋是行伍出身，完全靠自學成才。後又深造於將校研究所，官至陸軍上將。他多以正氣擅書傳世，所題聯語、匾額、詩句多為行書或行草。但如此工整華麗的早期作品，不要說外界難得一見，就是朱家後人恐怕也是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令人驚喜。非常了不起的是香港大學歷經戰亂，尤其在日本統治時期尚能保存此匾額到現在。同樣，馮平山圖書館全體同仁功不可沒。張慕貞對筆者如是這般說道：頌辭以 54 長短句合成，內容以興學育才為主旨及作起結。大致分為三段：“第一段講的是古今中外興學育才的本旨均相同。第二段是讚譽英國在香港設置大學，為我國南方興學之先河。最後一段是勉勵畢業生，要飲水知源，更要顧兩國敦睦邦交，長治太平。全文自然流暢，言簡義正，雍容大度，是一篇難得的頌書。”香港大學建校初期曾得到國民政府的資助，1915 年北洋政府亦在香港設立五個獎學金，又被稱為大總統助學費（The President Scholarships For Encouraging Learning）。朱子橋於 1916 年履任廣東省長，雖然時局艱苦，但仍承接捐助的責任，十分了不起，足可見他重視教育的程度。¹

1916 年 12 月 14 日晚，香港大學大禮堂裡舉行了隆重的首屆畢業典禮儀式。廣東省長朱子橋撰寫頌辭，贈予香港大學的首屆畢業生。首屆畢業生中包括工程學士十二名，醫學士八名，以及文學士三名（港大馮平山圖書館長林棟就是這三人之一）。當時香港大學僅有學生兩百人，而教授講師就有三十五人。二十三位畢業生能脫穎而成材，可見當時港大的嚴格治學精神確

1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特藏部張慕貞提供資料。

實不一般。朱子橋除了贈送頌辭給香港大學首屆畢業生外，還撰寫了《家庭教育》一書，這部著作至今被中國教育界譽為佳談。古今中外，著書立說指導家庭教育的，一般都是文人學者。可在民國初年，《家庭教育》這本書卻出自於僅讀過五年私塾、行伍出身的朱子橋之手。這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甚稱為奇。一個省長的薪俸足以養家，吃喝不愁，但朱子橋不但編寫了白話文的《家庭教育》一書，更自己掏錢印刷出版了這本書分與大眾。然而朱子橋這個省長卻又與廣東最好的買賣無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麼就來看看丁文江在他的文集中是如何表達他的觀察的。

丁文江說：朱子橋他是民國以來第一位廉能的疆吏。他在黑龍江和廣東的政績，我並不知其詳。我只曉得凡有廣東、黑龍江兩省的人提起朱子橋將軍，沒有不肅然起敬的。賑災的捐款，華僑是大宗的來源。他們捐款的條件，往往是只要朱將軍個人的收條。民國十七年（1928年），我在澳門去參觀賭場。遇見一個侍者告訴我：現在澳門的生意遠不如從前了，因為省城河南地方已經開賭了。他又說：“先生你是外江人，不知道賭是廣東最好的買賣，做官的沒有不靠這個發財的。只有朱將軍不肯要這筆錢，其餘的哪一個不弄幾十萬。”事隔多年，一個澳門賭場的侍者，居然還能記得當年與廣東最好買賣不沾邊的、也不靠賭場發財的廣東省長朱子橋。可想而知，朱子橋在民間的影響有多深、有多大！

四、朱子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行政特區的首任行政長官，丁文江說：他呆不長了！

在這個段子裡，筆者仍以解讀丁文江對朱子橋在1922年一個冬天的了解和觀察為主題。丁文江說：那一年的冬天，他到了奉天市。¹ 恰巧，已經出

1 奉天市，今瀋陽市。後文另有“奉天省”，乃清代至北洋政府時期遼寧省舊稱。

任中東路護路軍總司令和東省特別行政區長官的朱子橋將軍也在奉天。見面後，朱子橋十分高興地約丁文江去逛北陵。¹ 丁文江說：那是十二月的氣候啊，颳著大西北風，都零下十幾度了，他穿著皮大衣都冷。而這位朱子橋將軍卻只穿夾呢的軍服，外面只披著一件夾披風，下了汽車，各處快跑，卻也沒有有一點兒瑟縮的樣子。晚間，丁文江回到他在奉天的一位熟人家裡吃飯。主人聽丁文江說他和朱子橋去逛了北陵，大笑道：你碰上了這位先生，真是晦氣。請問這種天氣，除了他還有誰想逛北陵？在此地沒有一個不討厭他。他是老前輩，凡有宴會，人家不好意思不請他。他又每請必到，穿著軍服，正襟危坐。凡是要吸鴉片的（註：吸毒的）、叫條子的（註：召妓女的）、推牌九的（註：賭錢的），都覺得不方便了。（朱子橋）他既不喝酒，也不吃菜，只曉得等來飯。叫一桌子客人坐在那裡等他，請他吃酒席真是冤枉。請朱子橋吃飯最好什麼菜都不要預備，給他幾十個水餃就行了。這位主人接著又對丁文江說：“你是做買賣的人，何必和這種人來往？”於是，丁文江知道這位朱子橋將軍在東省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的職位上呆不長了。

果然，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丁文江說他在上海見到朱子橋的時候，他已經辭職了。於是，就邀請朱將軍和朱的舊部溫應星² 作陪，在家中小聚。丁文江說笑道：家裡人以為三個人吃飯，有一百隻水餃一定夠了。哪裡曉得（朱子橋）他老人家什麼菜都沒怎麼吃，卻一口氣吃了六十個餃子。丁文江敬佩朱子橋的樸實和直率，更為朱子橋的正派、清廉、不混跡於污濁的人格所折服。

1 北陵，原清太宗陵，在瀋陽市北面。

2 溫應星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的中國軍人。回國後，擔任孫中山南方革命政府第三科科長。國民黨員，後由孫中山推薦在朱慶瀾擔任行政長官的東省特別行政區公署內，出任特別行政區警察總管理處處長，少將軍銜。後又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宋子文的稅警總團中將團長。1968年去世後葬於美國西點軍校，是美國西點軍校惟一接受下葬的中國將軍。其子溫哈熊曾出任台灣聯勤總司令，與家父同年出生在黑龍江的哈爾濱市，是幼年的玩伴。

五、他是賑濟救災的大官兒，還是放賑的夥計？

民國十八年（1929年）至民國二十年（1931年）之間，據朱子橋的隨從陶弗卿對筆者口述回憶：“那兩年間，朱子橋在西安加在一塊兒一共只不過住了半年左右。其餘的時間都花費在親自出訪三省災區、了解災情、在全國組織募捐賑災款項與安排糧秣事宜並親自隨車押運賑災糧和護送災民去東北殖邊的路上。自民國十八年起，朱子橋發動各方，購糧施賑，先後到過災區多次。此時他（朱子橋）又徵集了食糧三千噸，向北寧鐵路局借到機車三輛及鐵篷卡三列車，將賑糧運往河南。不料，正值中原大戰，災區更是一片混亂。半路上軍隊將機車完全摘去，軍隊要徵賑糧為軍糧，以致糧車留滯新鄉一帶，無法前進。朱子橋當即向在鄭州的西北軍總指揮部提出嚴厲質詢。總指揮部的鹿鍾麟處境尷尬，不敢怠慢，當即接受朱子橋提出的三項要求：一是發還北寧路機車三輛。二是指派高級軍官隨車出發。三是通令西北各省地方官，凡屬施賑地區，停止徵糧、徵款。這第三項是朱子橋身歷災區的實地經驗。因為西北的地方官往往不顧災民剛剛領到的賑糧、賑款，又陸續徵發，等於將賑濟救災的糧食變相為西北軍籌辦軍糧。所以特別提出，賑糧與軍糧不能混為一談。次日出發，西北軍總指揮部派劉姓軍長隨車，防止部隊強徵火車頭，以備沿途諮詢接洽。總指揮部的鹿鍾麟並派自己的秘書陶弗卿隨侍朱子橋左右。（註：從此，陶弗卿就跟隨朱子橋了。）就這樣，運糧車在朱子橋的親自押運下得以一直向災區駛去。”

據當時隨行辦賑人員中，另一位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李晉回憶：車過鞏縣，糧車重載，機車無力負荷。除朱子老外，我等均下車步行。並將列車拆散，分節拖拉。此時突見子老躺臥的鐵篷車向下直溜。司機緊急煞掣，已隆隆發出巨響。我等奔往省視，則見朱子老睡眠惺忪、渾若無事，還向我們安慰道：‘這怕什麼？這怕什麼？’¹此乃將帥風範。”那麼，讓我們再來解讀一

1 李晉口述、秦嶺雲筆錄、蔡登山編：《民國政壇見聞錄》，第246頁。

下丁文江又是如何觀察此事的。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丁文江說他從貴州考察回來，從上海坐船到塘沽，在塘沽車站等火車，忽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回頭一看是朱子橋將軍。寒暄之後，朱子橋拉著丁文江到他的車上坐坐。丁文江說，他一看朱子橋坐的是一節鐵篷車，掛在一列糧食車的最後面。他（朱子橋）的鋪蓋攤在地下，旁邊放著一個小爐子是用來燒飯的。丁文江問其所以，朱子橋淡淡地說道：現在蔣（介石）同馮（玉祥）打起仗來了，¹ 陝西的人民都要活活餓死了。想做些慈善事，弄點錢，買幾車糧食運到西北去。要用車輛運輸已經很困難了，有了車輛，還要弄火車頭。好不容易火車開出去了，走不到幾站路，火車頭又被人搶去了，現在臨時還得想辦法，正在等火車頭呢。丁文江對朱子橋說：“子老你何必自己押車呢！派兩個得力的職員還不行嗎？”朱子橋對丁文江說：“你哪裡知道！現在他們打仗，車輛和車頭都很缺乏，糧秣也不充足。要不是我自己在車上，不但車輛、車頭半路上要被人搶去，連糧食也都要沒有著落！好在我沒有什麼事。從此地走起，運氣好，五六天也就可以到鄭州了。到了那裡和馮煥章²接洽好，再向西就沒有困難了。”丁文江聽了朱子橋這番話，覺得無言可答。過了一會兒，火車來了。丁文江他說他本想坐頭等車廂的，但想起了朱子橋的那節鐵篷貨車，心裡很慚愧，就買了一張二等車票回北京去了。

再讓我們回過來，聽聽當年賑濟委員李晉對這段運糧賑災的回憶。李晉說：“我們為了要趕回沿海各省，促進‘三元錢救一命’運動，旋即踏上回程。朱子老帶有災民二千餘名，轉送東北開墾。其時戰事已在發動，鄭州已經看見飛機。在新鄉附近，我們正碰上馮氏（馮玉祥）的專車，馮氏邀請我們到山洞辦事處一敘。他先向朱子老表達感激與歉意，次述山西小米弛禁及電飭孫良誠部借車運糧各情。在他把賑務上的事談論過後，遂送我們到站，

1 指中原大戰。

2 馮煥章即馮玉祥。

馮氏攙扶朱子老上車。馮玉祥在紀念朱子橋將軍的大會上，追憶當年見面這段往事的時候，哭述道：‘我說他瘦了，他說不要緊；我說怕是生活太艱苦，他說看看一般老百姓。’”¹

李晉說：“我今追述往事，略去浮文。獨將此節鄭重提出，意在說明當年辦賑，全靠得人才能實事求是，把捐款不遺涓滴地用在災民身上。”²談至於此，讓讀者們自己來平心而論，當年朱子橋是賑濟救災的大官兒還是放賑的夥計？公平地說：他既不是大官兒，也不是夥計。他就是一個有人性的、沒有丟掉善良的、不貪污、不腐化、有著貧民情結的、內心不骯髒的公僕。

六、馮玉祥回憶：我昔日在察（哈爾）抗日寇，他（朱子橋）送軍費十萬金，不然義旗何能舉？其實，朱子橋送的是民族魂和抗日的凝聚力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馮玉祥的後人分別三次在昔日抗日同盟軍誓師所在地張家口瞻仰故居、憑弔抗日英烈。全國政協委員馮洪志、全國政協委員馮荋伐、全國政協委員馮理達和丈夫羅元崢，均參加了在張家口市舉行的電視連續劇《馮玉祥》的首映式，並且講了話。同時還將馮玉祥將軍當年親筆書寫的“還我河山”條幅和為感謝朱子橋將軍籌措十萬元現大洋，捐贈抗日同盟軍而書寫的大型條幅，一併進行展示。這一展示，見證了昔日朱子橋領導的東北義勇軍和馮玉祥所領導的抗日同盟軍之間的情結和血凝成的紐帶。³

1 朱子橋去世後的同年 3 月份，重慶各界召開追悼大會。馮玉祥在追悼大會上朗讀其自作悼詩，即當時各大報刊登的著名的《哭朱將軍》。

2 李晉口述、秦嶺雲筆錄、蔡登山編：《民國政壇見聞錄》，第 240 頁。

3 據送錢人李晉口述：除了十萬現大洋，還有慰勞品和上萬件羊皮背心，出自李晉口述、秦嶺雲筆錄、蔡登山編：《民國政壇見聞錄》，第 291 頁。

1937年12月，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在山西洪洞縣給母親的一封信是這麼寫的：“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準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而面對熱河抗戰，對於承德被丟失一事，提到當時舊軍隊的軍官貪污墮落和地方政府貪污腐化時，朱子橋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一個軍官如果有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就決不能再打仗了。”這錚錚之言，何等相似，當年只有這兩位將軍說過這樣的話。

解讀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對朱子橋的另一段觀察：“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年夏天的某日，丁文江說他又看到了匆匆來往的朱將軍。丁文江記得朱子橋將軍對他講的一句話：“丁先生你是講科學的，凡事都要講計劃，講預備。我們只曉得幹，想到什麼就幹什麼，幹到哪裡是哪裡。等你計劃、預備好了再幹，人民都餓死了，國家也亡掉了。”丁文江無言以答。朱子橋憂國憂民，竭盡心力，賑濟救災，抗日救亡。¹丁文江又說：朱子橋三十八歲做統領，四十二歲做將軍，四十四歲做巡按使。如今他頭髮都白了，臉上的皺紋也多了。但是他這幾根白髮、幾條皺紋，救活了百十萬的災民，組織了十五萬義勇軍，為這個國家爭得了幾分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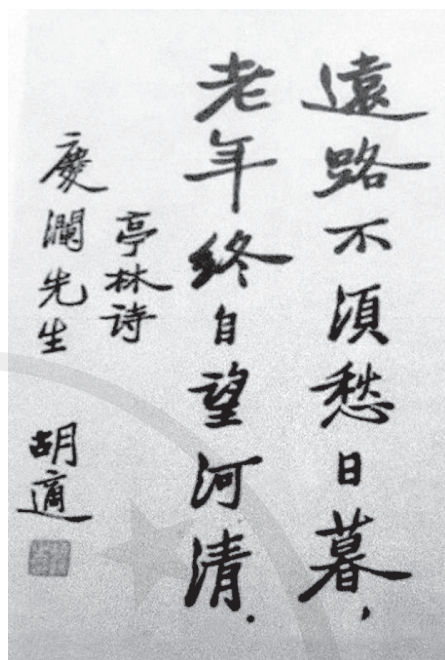
1 請看這一實例，頗能說明朱慶瀾當時對政府官僚作風的憤怒和焦慮。1933年2月11日，宋子文為熱河抗戰前線解決經費和給養問題，在北平與平、津銀行財團談財政問題。14日，宋子文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承認：“前線隊伍確萬分困苦，漢卿確亦無法支持。弟與金融家正在商量三個月計劃，以安軍心。”並向各將領表示“予以財政物資上盡所有之援助”。同時，朱慶瀾亦組織熱河後援協進會。大會推選朱慶瀾、丁文江、胡適、熊希齡等四十五人為理事，朱慶瀾為會長。宋子文講得很好，但許多地方無法兌現。據歷史檔案記載，遼吉黑熱民眾抗日後援會（註：另有“遼吉黑熱民眾後援會”“遼吉黑熱抗日義勇軍民眾後援會”“東北義勇軍後援會”等稱謂）會長朱慶瀾連續發函籲請，函電說現在的熱河是“大敵壓境，各軍雲集，為數不下二十萬。民食已窮，追求未已，運輸既困。一二日之後，恐日人不必來攻，我已自潰”。要求政府立刻解決糧餉和服裝等問題。直到3月1日，國民政府的實業、財政、內政三部才開始討論，決定呈請行政院通令各省市，鼓勵糧食商人或商會將糧食運往熱河銷售，並由政府設法協助保護。（《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二史館藏資料》）實際上，在三部聯合討論這種辦法時，熱河已大部淪陷。待三部會函呈報行政院時，熱河已丟失半個月了。這就是朱慶瀾帶著憤怒和焦慮所講的那句話，“等你計劃、預備好了再幹，人民都餓死了，國家也亡掉了”的背景。

本文所解讀的丁文江講話和文字記錄，取材於 1933 年 2 月 26 日的《獨立評論》第 39 號和胡適為紀念丁文江所編輯出版的《丁文江文集》。文集中有丁文江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叫作《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坦率地說，丁文江作為民國時期的大作家、大文豪、著名的科學家，對朱子橋的觀察和交往的記錄，真正做到了落筆成金，把人物描繪得實實在在，彷彿一個活著的朱子橋又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相比之下，筆者對朱子橋的任何描寫和使用的文字就顯得蒼白了。因為儘管筆者是朱子橋的直系後人，畢竟沒有近距離接觸過，而完全靠父輩們的口述和回憶，靠的是民國時期那些當事人和他們的後代對我的口述回憶。而丁文江再現了朱子橋的談吐風格、雷厲風行的行事作風，以及以登高一呼的影響力，大刀闊斧地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以菩薩心腸，救飢拯溺，賑濟救災；以涓涓細膩之心，談論家庭教育；不貪污腐化，不擺官架，兩袖清風。彷彿一個栩栩如生的朱子橋，又出現在人們的視線內。這著實填補了我這個後人拙劣手筆的空白。

但凡一個有歷史淵源家庭背景的人，最初對家史的了解，多來自家族前輩的敘述。直接地說，並不是課本。因為在筆者出生後的那個年代，除了梁斌筆下的《紅旗譜》¹一書對朱子橋有過些正面描述外，似乎其他的教材與父母述說的家史根本就是相差甚遠。所以這也就有了大人們沒有放棄給孩子們講述真實家史的責任，而教師也有著給學生繼續講授編好的教材的內容的義務。這給一個想要了解真實歷史答案的孩子，造成了選擇上的迷茫。那就是到底該聽誰的，而這種迷茫一直延續到成年。最後筆者選擇了直接走向歷史人物和他們的後人，聽取他們的口述。走向檔案館查詢歷史資料，尋找答

1 《紅旗譜》，長篇小說，梁斌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年 12 月初版。作品吸收了中國古典小說人物相對集中、故事相對獨立、章節自成格局的特點，著重通過人物行動和對話刻畫人物性格。美國人 Joa C. Huang 認為梁斌雖然非常明白意識形態所要求的限度，但卻不忽視藝術標準，故《紅旗譜》是本好書。“文革”中，《紅旗譜》被批判為“寫錯誤路線”、是“黑譜”“反動小說”，1980 年代初，該書重又得到肯定。

案。這種滋味是痛苦的，也是孤獨的。有這種痛苦和孤獨還包括已逝的美籍華裔作者張純如（著有《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1937）。這是因為我們這些探尋歷史的人，一直是在和逝去的年華交流、和死去的人談話，最終我們了解到了歷史的真相。這就告訴我們，如果離開了口述歷史或者檔案的話，許多歷史真相是無法揭示的。英國歷史學者保羅·湯姆森（Paul Thomson）就是這麼認為的。他說：“檔案和口述歷史是關於人們生活的詢問和調查，包含著對他們的口頭故事的記錄。”



胡適送朱慶瀾墨寶（圖片由朱漢提供）

目前，將收集到的檔案和口述記錄彙集成文，這就是筆者現在想要做的事情。這是因為：歷史最精彩的部分往往就在檔案裡。任何一位滄桑的歷史老人的離去，都意味著一座歷史博物館的倒塌。目前能夠做的，就是將一座快要倒塌的、或已經倒塌的歷史博物館內的東西重新整理出來，以饗讀者。也許，這裡面可能講的都是一些極其平淡的故事。但它卻是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也可能曾經左右過一段歷史的變遷。不管怎麼樣，希望讀者們能喜歡或從中得到啟迪。

※ 該文發表於香港《春秋》第三季 2015 年第 1074-1076 期

※ 2015 年發表於中國錦州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會官方網站